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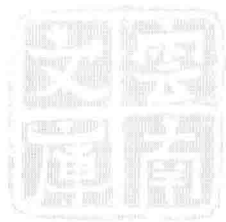


学术名家文丛

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

马汉儒 等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作者简介

马汉儒（阿允谟），1929年9月25日出生于洱源县。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至1958年8月先后在洱源县任负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城南区和第一区区委委员，第三区区长、区委书记兼区长，县委委员兼县委生产合作部部长，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



1958年9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员、副主任；1960年9月至1965年7月在中央党校哲学专业学习，获研究生学历；1965年8月至1970年3月任云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负责人；1970年4月至1975年4月先在省革委政工组研究组做工作人员，后任省革委核心小组办公室刊物组副组长、省委办公厅编辑处处长；1975年5月至1981年6月任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1年7月至1990年1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正厅级）。1988年6月获研究员职称。1990年1月离休。

20世纪60年代在中央党校校刊《学习》《习作》和《光明日报》《新建设》《前线》等报刊发表5篇论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撰写的论文、讲稿、调查报告、教学总结等近400篇、220多万字。其中，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有42篇（部）获地厅以上

部门给予一、二、三等奖或被评为优秀论文。如：（一）主持省级课题“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主编研究成果《哲学大众化第一人》专著，2004年2月获得省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贯穿邓小平群众观的一条红线》一文，2005年12月获省政府颁发的荣誉奖；（三）2008年5月，论文《试谈艾思奇同志“结合”就是发展的观点》，被中央党校等三单位评为特等奖。1991年5月至2015年12月主编著作（《中国企业大辞典·云南卷》等）共39部，总计1500万字，57550册。1990年11月至2010年3月，参编（任副主编、编委）著作（如《当代中国的云南》等），共20部，总计2655.3万字，64200册。1997年5月至2005年12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大出版社出版《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简论》等个人论文集3部。

1959年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评为“工作标兵”、1960年评为“五好干部”。1991年11月至2015年1月，四次获“云南省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奖。1996年3月获“学会工作先进个人”奖。1999年9月、2009年9月两次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00年5月获中关工委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称号。2002年2月获“全省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称号。2006年9月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称号。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被评为“中共云南省委政研室年度优秀共产党员”四次。2009年7月获“云南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突出贡献奖”。2010年6月获“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勋奖”。2010年12月20日获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授予“弘扬延安精神征文组织奖”。2011年8月省关工委授予“从事关工委工作20年荣誉奖章”等。

总 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和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序 言

黄楠森

《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的作者把书稿摆在我面前，索序于我，我翻阅之后深感欣喜和荣幸。

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我感到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它提供了艾思奇的生平与思想的最翔实最完整的第一手材料。艾思奇是云南人，他后来的主要活动虽在外地，然而由于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同志把艾思奇的藏书及其著作和手稿赠送给云南省图书馆收藏，加上艾思奇故居纪念馆的大量珍贵材料，云南学者就拥有了关于艾思奇的全部的第一手材料，得天独厚，这是其他地区的学者无法获得的条件。作者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按照时间顺序，从艾思奇的家庭、童年写起，记述了他一生的活动和思想，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

第二，本书虽然是按时间顺序记述了艾思奇的活动和思想，但并不是一本艾思奇传记。它可以说是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发展史，梳理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概括了他在哲学上的创造性贡献，评价了他的理论是非，从而摆正了他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中的位置。艾思奇无疑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其次才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是一个在学院里工作的学者，而是紧密结合革命斗争需要从事学习、宣传、研究、论战、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他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本书分为三编，分别评述了艾思奇的三个时期（1937年到延安以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哲学思想。作者认为第一个时期是艾思奇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奠基时期,对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开辟了一条道路。第二个时期是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形成时期,他的理论视野扩大了,理论内容丰富而深化了,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循着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途径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第三个时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艾思奇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他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与系统化、战斗性与科学性、普及与提高、坚持与发展结合起来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影响甚大,培养了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作者还指出,由于“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也有一定的偏颇和失缺。我认为本书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的功过是非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公允的。

第三,本书从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发展史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艾思奇不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的一代人,但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传入是在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可以说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自此以后的30多年间,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本书所作的论述可以看出,艾思奇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奉者,执着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进行顽强的斗争,但他没有自己的独特的哲学体系,像当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样。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就在于他宣传、捍卫、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他的贡献已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洪

流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思想武器，不是个人的一家之言。归根到底来讲，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但由于过去哲学家一般是在学院里和书斋里建构自己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是脱离人民的实际斗争的，具有超时代的假想，一个哲学家往往就有一个哲学体系。艾思奇不是这样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与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紧密相连，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既是他的哲学的源泉，又是他的哲学的归宿，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是完全一致的。

艾思奇的事业是坚持、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业，是中国人民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今天遇到了挑战，挑战就是机遇。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可以从《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智慧和勇气，来继续和发扬艾思奇的事业。

总之，此书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版对于在新的世纪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雲南文庫·學術名家文丛

前 言

艾思奇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1936年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7年到延安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中国文化》杂志主编、《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3月22日不幸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艾思奇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曾撰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讲稿，出版过多部重要哲学著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的《大众哲学》一书，开拓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的道路，曾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起过启蒙作用，为引导一大批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延安时期撰写、编辑、出版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哲学选辑》《“有的放矢”及其他》《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等文章、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对教育大批干部坚定革命理想信念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著作，为帮助一大批知识分

子和干部实现革命化的转变发挥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撰写和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教科书，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化、中国化，在各级干部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艾思奇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是“一个真正的好人”，^①“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②党内外的许多同志赞誉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光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在理论战线上不屈不挠的英勇战士。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建设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他为世人留下的数百万字的著作，既展示了一个哲学家探索真理的艰辛历程，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也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诞生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是云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今天，我们作为他的故乡的哲学工作者，从他的著作中，较系统地探讨、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将它作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保留和继承下来，并发挥其现实的启迪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义不容辞的。当前，在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用科学理论武装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各级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时代也更加迫切需要我们继续鼓励和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走出书斋和课堂，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在这种形势下，1997年1月，经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将“艾思奇哲学思想研

①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② 转引自：《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究”，作为云南省“九五”社科规划重大课题立项，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本课题的研究和成果，经课题组反复讨论，主要遵循的思想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来研究和阐述艾思奇的哲学思想。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艾思奇是我们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幸英年早逝，已是历史人物。对他本人及其哲学思想，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加以考察、研究、分析，才能有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因此，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坚持用历史的态度，具体地分析其哲学思想在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特征及其主要表现，以求比较准确地阐述其发展过程。

艾思奇是学者，也是战士；是理论家、教育家，也是革命家。在他入党后3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功不可没。对于他的为人，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和长期的战友周扬同志，在为《艾思奇文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评述：“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②当然，艾思奇与任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人物一样，也自然不是完人，他的一生有其成功的一面，毫无疑问，这是主要的方面，是不可以抹杀的；但无需否认，他在数十年革命的征途中，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性的影响，有缺失的一面，虽然这是次要的方面，也没有必要讳言。因此，我们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2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研究，还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该肯定的务必予以肯定，该否定的也应加以指出，做到忠实于历史，以事实为准，既不苛求，也不溢美。

在艾思奇短暂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在这些文章、讲稿、著作中，充满和洋溢着他的哲学思想的一系列主要观点。我们课题组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仅仅是从艾思奇浩瀚的著述中，选择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深入思考、分析、研究，以挖掘其中的属于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予以阐发。因此，课题组的研究着重于突出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是对他的哲学思想的论述，而不是他的传记。当然，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总是紧紧伴随着其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实践而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研究和阐发其哲学思想时，又不能离开其革命的实践活动，这就自然难免在某些章节的论述中，有若干传记式的色彩。但就总体而言，是着力于阐述其哲学思想。

马克思有句名言：“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①我们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这就是1994年11月间，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同志将艾思奇的藏书及其著作、手稿等珍贵资料，赠送给云南省图书馆存藏，加上其在腾冲的故居纪念馆珍藏的大量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可靠、丰富的材料。在研究中，我们还注意参考、借鉴和汲取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及专家、学者有关艾思奇哲学思想的颇有价值的一些论述。课题组总的设想是，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力求使我们的研究成果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关哲学原理论述的基本精神，并能较好地体现理论与实践、观点与材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和论述方法。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① 创新也是哲学的灵魂、动力和源泉，哲学不创新就等于没有灵魂、动力和源泉，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创新的哲学，它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发展不竭的动力和源泉，是永远战无不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艾思奇在哲学理论方面的创新精神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经过认真研究，课题组的同志深切地认识到，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丰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也是很多的。其中，使我们感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理论创新精神。他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和出版的《大众哲学》，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享誉全国，在几代革命青年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这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一种理论创新。在40年代发表的《论中国的特殊性》等大量文章和著作中，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一步做出的贡献，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理论创新。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讲授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以及撰写、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书，第一次正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版本，这也是一种理论创新。作为哲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艾思奇这种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进一步促进哲学的大发展、大普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课题组同志的共识。

以上几点，是否妥当，热忱地盼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2001年10月

^① 转引自《求是》2001年第2期，第61页。